

我的 愤青 岁月

(德) 佳杰思 Adrian Geiges 著

史竞舟 译



WIE DIE WELTREVOLUTION
NMAL AUS
ERSEHEN IM SCHWARZWALD BEGANN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我的
愤青
岁月



(德) 佳杰思 Adrian Geiges 著 史竞舟 译

WIE DIE WELTREVOLUTION EINMAL AUS VERSEHEN
IM SCHWARZWALD BEGANN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愤青岁月 / (德) 佳杰思著; 史竞舟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80225-608-8

I. 我… II. ①佳…②史…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数字 (2009) 第006270号

WIE DIE WELTREVOLUTION EINMAL AUS VERSEHEN

IM SCHWARZWALD BEGANN

By Adrian Geiges

Copyright © 2007 Adrian Geige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我的愤青岁月

(德) 佳杰思 著 史竞舟 译

责任编辑: 宁 馨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陈 栋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09年2月第一版 2009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08-8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中文版序

一提起中国人来，我的外祖父总是胆战心惊：“他们太多了，如果每个中国人拎一根棍子，背一袋大米，一直往西走，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

自他说这话，一晃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这期间，中国人的确征服了整个世界，不过不是用棍子和大米，而是用他们创造出来的产品。前不久，我的一位北京朋友到德国旅行，想给家里人带几双阿迪达斯运动鞋，当她在一家店里问有没有不是Made in China的阿迪达斯时，却引来了售货员们的讪笑，因为这里所有的阿迪达斯都是——中国制造。

年轻的时候，我是个桀骜不驯的“愤青”，外祖父越是危言耸听，我就越是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着迷。所以在我的生命里，我一路向东，越走越远：从西德到东德，然后是苏联和独联体，再后来是中国。

当然，那时我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认识还很肤浅。我走过了那些陌生的国家，渐渐地了解到更多，经历了许多文化冲击，同时也改变了自己，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内容。它不仅反映了宏大的历史事件，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深刻变革，而且也叙述了一个个真实生动的人物，他们的人生际遇和情爱挣扎。

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是一条移动的界线，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摇摆不定。

——《古拉格群岛》 索尔仁尼琴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以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

——墨子

目 录

中文版序 / 001

黑森林里闹革命 / 001

爱的禁区 / 009

自动步枪与和平鸽 / 051

人在莫斯科 / 102

潜入红灯区的探子 / 125

长鼻子老外在上海 / 153

中国特色的“小资” / 190

后 记 / 216

黑森林里闹革命

在我的家乡——布雷施高地区的斯陶芬，我一度曾是个惊世骇俗的人物。那时，我最要好同学的父亲成天骑着自行车在我家门前巡逻，为的是不让他儿子和我碰面。我对这个老家伙很是反感，他凭什么这么对我？说到底，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毛头，连混混都算不上。我一不偷二不抢，成绩优异，留着一头按当时的标准来说中规中矩的短发，更别说沾过大麻之类的东西。在性的方面我也非常保守，严格地说，我还没和任何姑娘上过床——最多不过就是在—辆房车后面吻过莫妮卡，也就是酒商威斯勒的女儿。为这我老妈还拿地毯拍子把我狠狠揍了一通。

我从一个胆小如鼠的局外人变成全城上下妇孺皆知的叛逆者，和我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一样，是从一本书开始的——一本可以塞到牛仔裤屁兜里的小红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毛泽东语录》，在西方国家，人们把它称做“毛圣经”。我是在我父亲的书架里发现这本书的，他是一位自由摄影师。1933年以前他曾是德国共青团的成员，之后他虽然远离政治，却因为唾弃纳粹而在二战即将结束前不久被作为叛逃分子缺席审判，定为死罪。正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他又生性温和，所以对左翼思想和“毛圣经”都抱有一种宽容态度。

十二岁的时候，同龄人都忙着踢球或是和女同学搭讪，我总是在学校

的小操场上埋头啃读“毛圣经”。只要一看到我捧着“毛圣经”蹲在我们浮士德文理中学大礼堂里，同学就骂我“赤猪佬”。对我友好一些的，则叫我“红耗子”。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学校里的“红耗子”越来越多，而我成了他们的头头。我们一起为低年级组织罢课，还通过斗争在当地建起了一个青年活动中心；我们散发反对核导弹的传单，在计划修建怀尔核电站的工地上示威游行。

我母亲的娘家姓叫茨威富尔，这个词在德语里恰好是“怀疑”的意思。当年，身为空姐的她和我的父亲在飞机上一见钟情。我的母亲，无论根据国籍还是信仰都属于不折不扣的瑞士人，所以她对我所热衷的活动自然也就嗤之以鼻。“你真是死不悔改啊！”她一面在我们家的楼梯上“咣咣”地上上下下，一面气急败坏地大声抱怨。我的妹妹乌拉，多年后成了一位功成名就的芭蕾舞演员和编导，当时她每天都要去上舞蹈课。“我们家的孩子个个都中了魔怔，”妈妈对邻居抱怨道，“女儿是芭蕾舞，儿子呢？——共产主义！”

在我与“毛圣经”结缘的第六个年头，还有几个月就要中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朋友和同志卡勒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有“紧急的事”要和我谈，而且“今天就谈”。电话里是不能说的，谈话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我们坚信，联邦宪法保卫局、美国中情局都会监听我们。学校的老师，甚至火车司机都因为参与左翼活动而被开除，所以最好还是谨慎从事。

是不是卡勒又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也许今天我们要去张贴革命海报，宣传反对右翼势力的摇滚乐，或者反纳粹、反排外主义的音乐会？要么是去喷刷反对中子弹的标语？——我们经常这么干。可卡勒在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却那么紧张，同时还有点郑重其事的味道。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从斯陶芬到弗莱堡有二十公里的路程，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琢磨。在这个初春的下午，我一个人站在足球场对面的马路边，张望着有没有可以搭乘的过路车。气温不到十度，我冻得浑身哆嗦。过了没一会儿，天上就开始飘雨。我身上只穿了一件毛线衫，而且为了显

示潇洒还故意敞着怀。眼见一辆辆汽车从我身边呼啸而去，我开始焦躁起来。这些司机肯定是看了《图片报》¹上的那种公路抢劫的新闻，所以把路边每个等着搭便车的人都当成了嫌疑犯。想到这里，我不满地朝那些汽车远去的背影挥挥拳头。

已经两点五十了，离我和卡勒约定的见面时间只有十分钟了，迟到的话会很尴尬，尤其是在他这个劳工青年团（也就是德国的共青团组织）的县区干部面前。

正当我焦急不安的时候，一辆车在我面前戛然而止。开车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留着时髦的短发，浓妆艳抹，衣着大胆。当时的我还只是个不起眼的毛头小伙，毛线衫下面套着已经褪色的旧T恤，下身是再普通不过的条绒裤，脚穿一双破旧的球鞋。我个头一米八，人却瘦得像麻秆一样，简直可以在电影里扮演瘦骨嶙峋的集中营囚犯，脸上还长着雀斑，蓬乱的头发盖过耳朵，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傻里傻气的眼镜，无论从哪一点看，我都绝对不是一位时尚男士。但眼前这个女人却似乎对我这样的青涩男生格外偏爱，她一只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肆无忌惮地放到了我的腿上。我嫌恶地把身子挪开，心想：这个资产阶级臭女人，难道想老牛吃嫩草不成！她说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我回斯陶芬，她都可以送我。我谢绝了。我既没时间也没兴趣，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办——去见卡勒，我的领导和朋友。

和我不同的是，卡勒并非“小知识分子”（提起知识分子他总是满脸的不屑，而且总要在前面加个“小”字），而是一家大型企业的工匠。他长发披肩，模仿列宁的样子留着一撮小胡子，还总穿一条鲜红色的裤子，号称这样显得更有革命气质。在学生聚会上，我总是暗自躲在一隅，怯怯地旁观别人谈情说爱，而卡勒则全然不同，他是个能把很多女人——当然只限于志同道合的团员同志——拥入怀中的调情高手。得逞后他总会问那

1. 创刊于1952年的西德报刊，具有右翼倾向，因耸人听闻和哗众取宠的图片新闻而闻名。

些姑娘：“和领导在一起感觉如何啊？”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的女朋友玛尔格特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为了省钱，卡勒平时住在父母家里。为了防止别人偷听，我们俩撑着伞冒着冷雨走在他们家的园子里，边走边谈。“今天我要和你进行一次干部谈话。”卡勒说，“亚德里安，你对自己的前途是怎么考虑的？”

我愣住了，原来卡勒是要和我商讨我的政治前途和未来职业。我可以向他道出自己心怀已久的那个梦想吗？我还从未对人吐露过这方面的心声。

迟疑了片刻，我说：“三年前我就入团了，而且现在已经是党员（我是在十六岁生日那天加入德国共产党的）。你……你知道，我……我一直很积极。”平日里，只要一紧张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结巴，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也许正是因为结巴，所以每到上体育课的时候没人愿意让我加入他们的球队，这让我觉得总是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可在共青团里不一样，卡勒和其他人都很接纳我。我鼓起勇气，继续说道：“当然了，我们中间有很多好同志，选派哪个人，必须由党来决定；不过，坦白地说，我……我真的很……很想……做专……专职的……”我指的是那些在我眼里非同寻常的专职干部，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庸庸碌碌的小市民生活，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革命事业，他们是团员中的骨干、党的精英，是伟大的职业革命家。

我居然在关键的时候犯了结巴，真是丢人……但我实在无法克制内心的紧张。我心里明白，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恐怕革命烈士们在坟墓里都要被我惊醒了！这不是到电信局去做学徒，想申请就申请的，这不是兼职——这是天职！而且安排天职的人只能是党，而不是随便什么人。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被选拔出来。既然我和卡勒很要好，为什么不能和他谈谈自己的心里话呢？况且他自己也说要和我做一次干部谈话。

“问题是，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卡勒说，“不过你在过去几年里

表现不错，参加了团委和党委组织的所有活动。在你的倡议下，我们还往费尔宾格这个老纳粹身上扔过鸡蛋，迫使他后来不得不下台；你还为共青团招募了二十名新团员，成功地组织了罢课活动。组织上很信任你，所以我今天要问你个问题——你做好走职业革命家这条道路的准备了吗？你得认真地想一想再作决定，这可是一项不同寻常的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作出许多牺牲。一旦你作了选择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职业革命家是要战斗一辈子的！”

虽然这番话听上去有点故作高深，但看到他能这样严肃地和我谈话，倒也说明我是个受组织重视的人。我感到自己心跳加快。卡勒对我的毛遂自荐并没有生气，恰恰相反，以他为代表的党组织为我设计的革命前途与我的个人愿望竟不谋而合。当然再没有回头路可走，资本主义企业怎么会雇一名革命者呢？不过我可不想到那种地方工作——绝不！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肯为金钱卖命？我要从事的是战天斗地的革命事业！什么医疗保险啊退休金啊，那都是俗人才考虑的东西；何况等我老了的时候，社会主义红旗早就插遍全球了，还担心什么福利！

“卡勒，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清楚摆在自己面前的是条什么路。很高兴你能给我这样的建议，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嗓音尖尖的，像个女人。

“亚德里安，我现在跟你说的，仅限于你我之间，绝对不许有第三个人知道，不许对同班同学讲，不许对父母讲，也不许对其他同志讲。”为了强调自己的话，卡勒停顿片刻，又接着说，“我知道，‘红色经典’你比我读得多，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从来难不倒你，不过你还需要继续巩固你的意识形态教育。所以，作为要成为未来职业革命家的第一步，我们决定委派你去参加为期一年的培训。”

我不解地望着卡勒。对于党内的密语我掌握得不错，可“为期一年的培训”究竟是指什么？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短暂沉思之后，我提了一个听上去尽量不显得愚蠢的问题：“我要在哪里接受培训？”

“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像我刚才说过的，具体的情况要严格保密。你会及时得到指示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一年！完成秘密任务！我强忍住自己的喜悦，以免在他面前显得太过幼稚。卡勒毕竟比我年长五岁，对于这些事了如指掌。他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主义战士，曾经参加过抵抗希特勒的地下活动。卡勒的父亲是巴登-符腾堡地区的组织部书记，负责人事和组织政策，也就是说，是位职业革命家；卡勒的母亲是党的地区支部出纳，虽然只是个名誉职务，但大小也算革命人士。到干部学校进修的事当然必须保密，这个我懂。作为西德人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受革命培训，这在今天就好比派一个美国人到基地组织的大本营里学习自杀式袭击。

卡勒脸上“不自由，毋宁死”的严肃表情稍稍有所放松，他说：“最棒的是，我也要和你一起去——我也接到委派任务了。”接着他又笑着补充道，“我负责监督你。”

我兴奋至极，充满传奇和冒险的革命生涯正在向我发出召唤，而且有我熟识的朋友结伴同行，心理上会感觉更加安全。我也为我的朋友卡勒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也将荣升为秘密组织中的革命干部了。我浮想联翩，开始憧憬着这样的情景：当我的高中同班们正在上大学、服兵役，积极谋划庸俗的小市民幸福生活时，我已经远赴异国他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轰轰烈烈地投身革命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家人朋友讲，但就像卡勒所说的那样，随便编个什么“天方夜谭”还是容易的。

现在我再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共青团员了，而是被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一名革命干部。六个星期之后，我和卡勒一起乘火车前往多特蒙德，去参加为将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的秘密培训而组织的筹备会。后来我得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其他，正是民主德国。

生平第一次，我踏进了劳工青年团中央神圣而庄严的办公大楼。这是一栋貌似平常的水泥建筑，钢制的安全门上装有监控摄像头，这是联邦德

国这个由资产阶级敌人控制的国家内一些不屈不挠的抵抗分子的大本营。面对新纳粹和国安局的袭击和骚扰，我们必须自我保护，这就是此处之所以戒备森严的原因吧，我心想。

我和卡勒被带到了一间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在这里见到了另外三名被选拔出来的同志，他们将是我们的未来大学同学。团中央一个两米高的大个子同志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在讲话的第一部分，他一直在对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大批特批，斥责他们“搞泛欧洲同盟，大有蜕变为社会民主党的危险”。我不解地问道：“难道共产党人不应该团结一致反对右翼势力吗？”讲话的同志宽容地笑了笑，说：“我们赞同所有左派和民主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我们绝不容忍投敌叛变者。关于这一点，将来你们还会‘在校上’得到更加深入的教育。”“在校上”？这还真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词语。尽管我心中一时还充满疑惑，但想到自己已然成了这个秘密同盟中的一分子，骄傲和自豪的心理还是占了上风。

接着，劳工青年团中央的同志开始切入这次预备谈话的“核心点”——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问题。只听他提高了嗓门说道：“你们是受了委派的，肩负明确的战斗任务，那就是学习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并且最终将它们运用在这里——联邦德国。你们的战场是这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他说的每一句话里都少不了“战斗”这个字眼。“你们将在学校里遇到来自全世界的战士们，来自欧洲的，来自智利、越南、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的——当然了，还有来自民主德国的‘自由青年团’团员。大家必须要牢记一点，那就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绝不允许的！”

谁也没有听明白最后这句话和报告的其他内容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就连经验丰富的卡勒也不明白。团中央的报告人试着加以解释，但他的表述听上去颇有些复杂：“我们必须吸取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有些同志只顾沉湎于男欢女爱，却把自己的战斗任务抛至脑后。这些行为如此轻率的人，他们要为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死难者负责！”

原则上，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专门针对以下情况：与他人发生恋爱关

系者，日后很可能会到对方国家生活。而我们应当在结束了一年的培训之后回到联邦德国继续战斗，因此——严禁恋爱。

我对此没有异议。对我来说，为了革命事业，过一年苦行僧式的生活又算得了什么呢！

爱的禁区

我十九岁生日时收到的第一句祝福，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防部队的一名军官。九月三日凌晨三点，在六人座火车车厢里睡意正浓的卡勒和我被这位军官推醒，当时我们正在从弗莱堡去往西柏林的途中。“我注意到了，今天是您的生日。生日快乐！”他说。尽管我们只是从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前往资本主义的西柏林，他还是一丝不苟地研究着我的护照。他的认真和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份刻板和执著充分说明了普鲁士精神和马列主义是可以辩证统一的。这位同志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也是自己人。从外表上看，我们和所有以私人身份前往西柏林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一路上也没人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

早上，我们在西柏林动物园一站喝了咖啡，吃了肝泥肠小面包——这是我们在资本主义地界上的最后一顿早餐。接着，我们乘快速列车到了弗里德里希大街，也就是东、西德之间的边界线。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我们没有护照，而当时过境的西德人必须持有护照。卡勒安慰我说：“别担心，边防军同志们已经接到上级指示了。”我还学到了一个新名词——“接应”，它是指某些人通过秘密渠道，可以在不持有护照的情况下直接跨人民主德国的地盘。这听上去就像是对着柏林墙默念“芝麻开门”，虽然从西往东越过这道墙并不是通常的方向。

我回忆起了和班里同学一起乘车去布拉格的情景，当然那次是有护照的。表情生硬的东欧边防警把我们上上下下搜了个遍，就差掏衣服口袋了。光检查护照就用了十多分钟，摆副冷脸似乎是他们执行公务时的规定。当然了，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必须显示出凛然不可侵犯的面貌；更何况，我们班上的很多人正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除我之外，所有的人都在黑市上兑换德国马克。

带着脑海里浮现出的记忆，我扫视了一下眼前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看到几个一脸阴沉荷枪实弹的东德边防兵，还有几只在火车下东闻西嗅搜寻越境逃亡者的警犬。当时我把这看做必要措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大批的医生和工程师拥入西德，才能避免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东德被资本主义釜底抽薪。偷越柏林墙者，一经发现即当场击毙——对于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上方命令，我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一首名为《致后来人》的诗中找到了辩护理由：

面对卑鄙
无法不咬牙切齿
面对不公
不能不大声疾呼
我们这些追求友善的人啊
对待敌人却不能心慈手软

尽管如此，当我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连接东、西德的那条狭窄的过境通道等候检查时，我还是提心吊胆，生怕出什么意外。检查护照时，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美国人。这个人只会讲英语，我听到岗哨上的东德边防兵在用德语对他骂骂咧咧。那个军官对我会是什么态度呢？我的心里不由得更加七上八下。

轮到我了。卡勒示意让我先来，为了不在他面前示弱，我只好硬着头

皮走上前去，一颗心怦怦乱跳。我出示了自己的护照，里面没有签证。我紧张不安，听到自己结结巴巴地说出了那句魔咒——“我是被接……接应的。”边防警瞥了一眼护照上的名字，脸上的表情刹那间由阴转晴，他笑容可掬地说：“同志，热烈欢迎您来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然后从登记簿里拿出一张准备好的单页签证，而没有在我的护照上加盖过境章——这样一来，我回国的时候敌国（也就是联邦德国）的边防警察就不会发现我曾经在东德待过一年。此刻，那位友好的同志朝我眨了眨眼，把我的证件递了过来，临别时对我说了一句：“祝你取得最大战绩！”这种祝福我还是头一次收到。在德意志土地上的第一个工农联盟国家——我们坚信它绝不是最后一个——卡勒也得到了同样方式的欢迎。

当我们走下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楼梯，踏上东德领土时，迎接我们的是崭新的生活。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这股味道将在接下来的十个月中伴我左右。我低头闻了闻自己的滑雪衫，对卡勒说：“我的衣服也沾上这个味儿了。”我们两个都笑了。乘着民主德国国家铁道部的火车，我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东德。

这里虽然没有西方那种五光十色的繁华，但一贯对消费社会抱以鄙视态度的我并不感到遗憾。不仅是共产主义理论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仰，那些宣传反共思想的敌方言论也把我推向共产主义：在东德买不到香蕉，在东德买一辆汽车要等上十年——与那些“大问题”相比，凡此种种在我看来实在是不足挂齿。在这里，掌握政权的不是昔日的纳粹余孽，而是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东德的环境并没有令我吃惊，因为之前我曾经对东德做过一周访问，当时是和代表团随行，参加“自由德国青年团”——民主德国的共青团组织——为我们这些西德同志安排的活动。

火车站的报亭挂着《新德国》，还有共青团办的杂志《青年世界》和《新柏林画报》。“幸好这儿没有《图片报》！”我说。卡勒点点头。我们生不逢时，没有赶上1968年反对《图片报》的游行示威，没能加入高喊